

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学意义

吴 戈

《民族艺术研究》2005 年第 4 期

—

中、美戏剧文化之间存在着历史不短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变化的语境里显现出不同的交流效应。在殖民语境的历史里，中、美戏剧艺术之间有过交流互惠，也有过意义阻滞与歧误。交流的有效性与文化成果取决于交流语境，而交流语境又受权力话语的支配。因此，研究我们当今交流立场和交流姿态的重要资讯。这是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中美戏剧 跨文化研究 文化学意义

研究的这个课题，在中外同行和友人间常常换来的反应是疑问和茫然：中、美戏剧有交流互渗吗？有没有资料佐证？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便对此视之为必然了。回首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东方、西方文化交流的“语境”，来品味人们所发出的弦外之音来。在资本主义忙于殖民扩张、热衷瓜分世界的 19 世纪，通过控制军事经济政治的“主动权”来控制世界，结构了一个先进的、文明的西方拯救落后的、野蛮的东方（包括非洲）的世界秩序和各国文化交流的预设前提——“殖民语境”。以这样的前提来安排世界秩序，东方国家、非洲国家就只有接受挨打、赔款、割地或者干脆就全面臣服。以此为“语境”的文化交流，非西方国家只能沉默失语、接受西方列强的影响和同化。没有双向的交流，只有单向的接受。在这样的交流语境中，对“中、美戏剧交流”的可能性存疑，就是极其自然的了。

非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就是在这样的预定模式与认识背景下走过了以世纪计时的历史。我们可以透过历史事实离开殖民主义者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的愿望有多远。

一 现代中、美戏剧交流的基本状况

现代中、美戏剧交流是存在的。无论其交流形式是单向的影响与被影响，还是双向的互动交流关系，或是多边交流中的惯常方式。中、美戏剧交流中这些交流方式都有。

中美戏剧交流究竟是什么时候、怎样开始的？

先生的说法，华人出现在美国的最早记载是在 1785 年。（1）但中国戏剧在美国登陆，应该是在劳工群体和早期移民中，已经难于考证。从一些资料记录和早期戏剧历史研究文献中，还是可以辨认出这种艰难发展的依稀轨迹。

文化交流颇有造诣和成就的宋伟杰博士认为，“最早引入中国人物的美国戏剧是《中国洗衣人》（The Chinese Washerman）（2）但事实上从现在可以查到的文本资料看，1852 年的美国戏剧舞台上开始出现了中国人的形象，那是在法国哑剧演员 Kim Ka 里（3），演出中间的中国皇帝和王公大卿的生活状态、中国公主归附法国“闯入者”的离奇情节的异国情调、东方风俗是演出的主要卖点。情节中心，是一个追求刺激、酷爱冒险、莽撞的法国年轻人乘坐热气球升空，突然事件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度恐慌，四处追捕热气球的发明人与操纵者——法国人，他在东躲西藏的慌乱中与中

藏匿和逃逸不成功，他面临被惩处的危险，结果是公主挺身而出恳求皇帝放过这个她所爱的陌生人，否则宁愿去死。去当中国人，做女婿；要么被装在大缸里沉水。几经周折，法国人当了驸马，大团圆。

在美国戏剧中出现中国人物、中国背景或中国题材，因为那还算不上戏剧交流，那只是说明华人群体及其生活引起美国故事对中国既浪漫又轻蔑的想象到对早期中国移民代表性职业的注视，这一转变表明，华人生活与美国人生活具有相似性，但是，离交流已经不远了。

至于何时何种场合，难于确考，但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两个美国戏剧——《黄马褂》和《孔夫子》的戏剧文化意义，它们都是都十分有意义的一种交流。

美国早期戏剧中反映华人、中国题材和背景的戏剧没有研究意义。不，它们很有意义。因为反映华人、中国背景与题材的戏剧有《新扫帚》（New Brooms Sweep Clean）、《好奇心》（Curiosity）、《和平驱逐》（Peaceful Expulsion）、《阿Q》（The Chinese Must Go）、《一堆奶油杯》（A Bunch of Buttercup）……这些剧作，恰恰可以说明现代戏剧交流之初，各自的交流话语进入的是怎样一种语境。

现代中、美戏剧交流活动是从美国人看中国戏剧、评价中国戏剧与中国人看美国戏剧、介绍和评价美国戏剧的时候开始的。涉及的是那样一些活动：在戏剧文化活动中相互注视对方戏剧文化的不同、表达认同或排拒、欣赏或厌恶的文化心理。在相互作用下结构两种文化或疏或密的相互关系并因之对各自的戏剧文化发生一定影响。我研究现代中、美戏剧交流，从搜集到的资料看，中、美戏剧交流的历史，源起于近代，几乎可以上溯到 19 世纪 50 年代。从成规模的华人登陆美洲开始，中国文化就作为这个游动的移民社区的附属物漂移到了那里，呈现在美国人面前。就像法宾·波尔斯（Faubion Bowers）在《东方的戏剧》（Theatre In The East）中所认识到的那样，“中国人无论去到哪里，都总会携带着他们祖国的巨大的影子……中国戏剧。不论他们走到哪里，有多少人口，他们都会很快建立起自己的戏院。远到东南亚，近到纽约市的曼哈顿，一处处戏院。”（4）中国文化与中国移民群体的关系，就像是一颗不会陨落的耀眼彗星拖着巨大的尾巴那样，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这种文化中最具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族群生活气息的一种。

因此，中国戏剧是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中十分活跃而且重要的一种，也是四海华人强调文化身份重要仪式与重温族群认同的历史看，对族群文化活动而言，从华人登上北美土地的早期戏剧活动，到今天美国东、西海岸重要城市如旧金山活跃的各种京剧俱乐部、粤剧俱乐部看，这种仪式和渠道的重要功能显然是存在的。就两国文化交流而言，华人群体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的同时，也丰富了美国文化的整体内容。

两国交往的交流文化，使得中、美文化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发生在美国的民间文化之间、中、美学界学术研究之间的不同层面——即民间交流、学术交流和文化外交交流的层面。中、美戏剧交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 世纪 50 年代到 1919 年算是早期；1919 年到 1949 年算是中期；1950 年到 1978 年为中断期；1978 年至今为续接期。四个时期有各自的特点，早期主要是民间交流，中期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对西方戏剧的引进而向美国的学习，中断期还有学界在教育研究层面的活动，亦有学术交流。而续接期在经历了短暂的策略调整后，就进入了一个文化交流全面接触与深入的时期。民间交流、文化互访、学术交流，而且，在新观念、新形势下的这种交流格外具有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客观态度。

中、美戏剧交流中除了受“殖民语境”的影响外，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家利益的争端的影响也是显然的。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老舍 1946 年应美国政体机构的邀请访美，正是在中、美关系微妙、前途迷茫的时候；1980 年接受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美中文化中心的邀请，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没有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1979 年 1 月 28 日到 2 月 5 日对美国的成功访问并于同年 1 月 31 日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没有 1979 年 7 月 7 日中、美两国在北京签订的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的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中、美戏剧交流的谨慎接触。伊丽莎白·惠克曼（Elizabeth Whickman）留学中国南京，到江苏省京剧院潜心京剧学习，也正是因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就在此前的一年，阿瑟·密勒以剧作家个人身份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与中国剧作家见面。1982 年 8 月 17 日，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发表了内容为美国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联合公报，使 1979 年 4 月 10 日因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导致转“冷”的中、美关系重新“升温”。1983 年春天，阿瑟·密勒应邀到中国顶级剧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推销员之死》（Death of the Salesman）。一切都像是巧合。

在讨论中、美戏剧交流之前，我们先剥除驳杂的背景和变化流转的时代色彩不谈，只认定中、美戏剧交流大量存在这个事实。中、美戏剧交流有不同层面。在这些层面中，民间戏剧文化的交流，早期也最为广泛。学术交流晚些，而外交性的交流，则受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的极大牵制和影响，从来就没有充分展开过。因此，交流成果最多最大的，倒是民间层面的交流。这绝不意味着民间和学界层面的交流不受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价值系统的影响。

二 对中、美戏剧交流不同阶段的总体评价

（一）中美戏剧交流

在中、美戏剧交流，早期的成果不少，这时的中、美戏剧交流，更多是没有意识形态影响的纯粹戏剧文化交流，显得更为自然。早期成果体现为美国本土文化中的新的生成物。中国戏剧随劳工和移民到达美国时，正是美国戏剧文化萌生发展的前夜。淘金冒险的生活，与欧洲的风俗喜剧、轻歌剧和中国戏剧一道，构成了美国戏剧文化的最初积累。《黄马褂》（Yellow Jacket）是从演出风格、舞台原则和布景设计各方面都认真准备，以美国人的方式搬上美国舞台的一部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品。《黄马褂》的奇异幻想、曲折情节、异国情调和美女英雄故事，适合西部冒险的浪漫幻想和精神情感，加上金钱和好莱坞梦幻工场确保上座儿成功的一切元素。其流行 30 年左右的成功演出，完全可以说是美国戏剧文化乃至电影文化对中国戏剧的风格、舞台原则和东方情调的表现，所达到的水准恰恰是中国戏曲的影响成果，不是凭空产生的。与当时普遍地对中国人的丑化表现的剧本比起来，这些演出和制作，是中国戏剧文化影响在美国开花结果的典型例子。《孔子》对中国历史下过一番功夫研究，对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往来人物和命运沉浮的表现，都达到了一定深度，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在费正清的众多作品比衬下，它们显得弥足珍视。还不是因为其主观态度的友善公允，更因为其客观具备的交流意义。民间层面的交流，与外交层面的交流，是紧密相连的，但主观态度却影响交流，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中美戏剧交流

中美戏剧交流有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个时期，正在新文化创造运动中的中国戏剧，体验着新时代新要求下自身变革的痛苦和选择。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西方的同时，也走向了正在朝气蓬勃兴起的美国戏剧文化。就在这个时候，

求和美国群众性的戏剧文化发展势头一经遇合，就催生了很大的交流成果。这个时期，中、美戏剧交流的实际内容，对中国戏剧的影响性交流。交流是单向的。这当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原因。美国戏剧对中国戏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戏剧观念、体制和运作方式的确立等方面。事实上，对中国话剧的诞生与发展的研究，历来就有一个以讹传讹的源头在日本。其实，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发轫，从国内欧美新学校的教会宗教纪念日演出活动中排演西方话剧开始，排演“文明戏”的曲折。然后，重新起步向西方学习。

中国现代戏剧的创造，摹本不是日本新派剧，而是美国小剧场运动。中国话剧作为舶来品，学习西方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19年前为草创学习、努力失败的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后到20世纪30年代为第二次学习、努力的见效期。接下来就是艰难迈进了。（后来又有民族化探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式革新热、实验戏剧等等，已经不是本书要重点讨论的内容）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兴起、形成，西方文化的话剧以全新的姿态开疆拓土、生根开花，全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现代戏剧基础的《入侵者》、《灰衣人》和《醒》，洪深的《为之有室》等的真正西方话剧的创作，均完成于美国。而且，从戏剧普及活动的展开，戏剧理论的翻译介绍以及最重要的戏剧教育等等方面，美国成为了中国戏剧新文化运动学习的正面榜样。这倒是常有的现象，民族文化感到自身的变革、更新和丰富的需要时，会主动寻求可以借鉴的文化资源，并在消化吸收中，将其涵化为自己文化肌体里的新元素，这就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成长历史。在接受异质文化的话剧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对异质文化的学习与总结与省思的内容，这就会深入到文化交流中的原有基因与外来元素的关系问题上。

问题是：中、美戏剧交流的中期本来有一次深入下去的契机，很可惜，这次机会没有停留，而历史地错过了。再度继续的契机就是梅兰芳1930年对美国的访问演出。轰动是空前的，成功是巨大的，梅兰芳成为了20世纪中国第一位在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中心论这种殖民语境下，梅兰芳访问演出的成功就更显现出其非凡的意义来。在那样的语境下，决不会有真正的文化交流。成功的身后，不但给一些睿智的内行和真正的专家留下了一些别具慧眼的评价，而且使舞台实践出现了对僵化现实主义的追求和新的创造原则的确立。影响是深远巨大的。但在美学建构的总结上，显得就不如欧洲的思考那样系统和深入。梅兰芳在中国境外的“热”与在国内的“冷”的现象。中国大众和传统戏剧界对梅兰芳的成功是欢欣鼓舞的，但问题在于：一个在19世纪40年代就应被打败、被肢解、被侮辱与被损害、被视为“东亚病夫”的民族怎么会去追求价值相当、地位平等的位置上去与西方文化谈交流！别人不说，我们自己就先承认了。胡适博士的文化观点，可以视为价值自弃情感的代表。事实上，几乎就在同时期的曹禺后来在文化评价里的遭遇，也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梅兰芳在美国文化市场里既有艺术批评上的热情认可，也有公众票房的巨大成功。但在戏剧美学建构方面，梅兰芳只是在实践的努力上，而尚未深入到理论研究的层面上。这要等待梅兰芳对欧洲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或东方戏剧对美国有了巨大影响后，才开始理论上的深入思考。也许，这种表现，可看作是理性的欧洲人和勇于实践的美国人对梅兰芳的接受方式的不同，其反应的不同也是在所难免的。

从文化心理与文化视角看，梅兰芳当然是中国戏剧的代表，东方文化的象征。梅兰芳是那个时代中国乃至东方的文化符号。这样看的，所以，到北京最要紧的是看故宫、长城、梅兰芳，这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但具体到文化交流时，问题就会

《亚洲戏剧杂志》（ATJ）上曾经有一篇文章《向西方人介绍一种异国情调的艺术：梅兰芳在纽约》

Occidentals to an Exotic Art: Mai Lanfang in New York）（5）从标题就明确地点明了这一点。所以，在赶时髦的嗜好中，沉浸在自以为是的“真实尺度”的衡量与选择里。所以，肤浅之处也是有的。因此，不可否认的是，梅兰芳的成功演出带去的中国戏剧艺术，当时没有对美国舞台进而对西方戏剧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论建设上的影响。直到苏联面对集一时之盛的一群西方戏剧大师演出，产生震撼性的效果后，才由欧洲思考带给美国一些新的、整体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美国戏剧界、单个的文化现象了。

中、美戏剧交流

因为中、美两国政权力量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是一个非常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从意识形态出发，干涉中国事务，并从美国利益出发，考虑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全球布局，政策性地使得中美关系陷入对峙。客观的局势与主观的政策，使得中、美戏剧交流中断了，中间，是中苏戏剧交流的“蜜月”。国家关系的冷峻深刻地影响到了戏剧交流，但研究性质的交流却没有停止。这个时期的中、美戏剧交流在研究者那里延续，像 A·C·柯普兰的努力，翻译、介绍和身体力行地按中国风格排演中国戏剧来培养戏剧人才，成绩斐然。另外，美国政府鼓励“研究共产党中国的戏剧文化特点的文字。许多中国戏剧的翻译，包括样板戏的翻译介绍，都产生在这个时期。

中、美戏剧交流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乒乓外交促使中、美关系解冻。美国留学生魏丽莎到中国留学，师从梅兰芳的高足沈雁冰。中美关系的新发展诸多方面实质性的合作交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一个象征，它续接上了半个世纪前梅兰芳远赴美国开展而没有开展的中、美戏剧交流已然断了的线头。

中美戏剧交流有这样一些事件和特点值得关注：首先，交流开始双向，这两个很早就有交流的国家的戏剧家们开始双向交流。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留学生群体与魏丽莎（Elizabeth Whickamnn）、康开丽（Claire A. Conceison）等美国戏剧家和西方人对中国戏剧的独特价值认真理解、认识、学习、研究的态度和行动。其次，中美两国戏剧艺术家的工作互有交流：曹禺的访美演出；英若诚的赴美讲学与执导；河南豫剧团的《榆树下的欲望》的赴美演出和美国戏剧文化推销员阿瑟·赫斯顿的《推销员之死》；赫斯顿到中央戏剧学院讲学并在北京人艺执导《哗变》；魏丽莎和她的夏威夷大学团体的中国戏剧演出；孙惠柱和费春放作为留美学生致力于戏剧的跨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他们的介绍和他们的融合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努力。孙惠柱和费春放作为留美学生致力于戏剧的跨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在戏剧创作上演和中国大陆当代舞台戏剧动态、戏剧理论介绍等工作表现出的文化交流自觉意识，与第一代留学美国修习戏剧的学生们：他们既是学习者，又是传播者。在他们的努力中东方和西方的交流互动实际能够走多远？有多大程度上的融合？《推销员之死》是个寓言。《挂在墙上的老 B》、《明日就要出山》、《电传香格里拉》、《汉雷——中国孤儿》和《四川好人》等作品。他们在跨文化“项目”方面的努力与对美国当代环境戏剧和社会表演学倡导者谢克纳的介绍引进，都是值得肯定的。

三 中、美戏剧交流的现实处境

戏剧交流进入历史背景下和社会生活中考量，就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层面的问题。

文化交流在不同文化之间都可以建立从形式技巧到思想成果、社会内容的比较、揣摩、碰撞、冲突、借鉴、涵化的

意识形态尖锐对峙、价值取向南辕北辙、民族文化心态高度警觉的时候，别说丰富的内容，就是异质文化特征明显，也成为交流的障碍问题。回顾中、美戏剧交流走过来的百年历史，不难发现：文化交流的不对等、不均衡和交而不流，殖民语境时代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文化进化论与殖民扩张的需要对文化交流需要的遮蔽，而后殖民语境时代全球生存权利、民族自决权利的尖锐矛盾又障碍着文化交流的安全感。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主题任务是救亡，后殖民时代，最有价值思考和实践的问题是：如何图存？政治经济上独立、国家主权完整，文化身份明确，恐怕是最为基本。后殖民语境下西方话语、霸权气与优越感依然存在，而且是显而易见的。帮助与施加影响的渴望，远远超过学习了解。博士在上海《文汇报》组织的 2002 年上海艺术节论坛上于 10 月 30 日作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演讲，另一种文化产生积极兴趣的理由是：一种想要理解的渴望，想去帮助的渴望，和想去施加影响的渴望。”（6）这种心态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延续，只不过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殖民理论变成了霸权策略。

重点是讲民主，谈人权，说公平。否定种族歧视，强调文化多元。但是，通过跨国企业的力量、建构贸易规则、推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是政治寡头的帝国主义有关霸权时代全球秩序理想的一种运行真就按照市场规律自然调节了。问题是：谁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谁管理市场？

1 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一次讲话中阐述他构想战略原则，向全世界点明了上述问题：“改变之以主动积极的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的价值观念普适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全球；‘美国要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竞赛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赛将限于贸易和其他和平事业。’”（7）这是不折不扣的世界霸权宣言。布什构想的绝对军事力量的管理维持下，全球各国按普适于美国的美国价值原则进行贸易和其他和平事业的竞争。美国这个正义，也就是服从于美国价值。联合国的意义被美国价值所取代，全球化进程被导入了美国轨道。

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时下新帝国的美国所谋求的世界新秩序时指出：“‘新帝国’的形成是欧洲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型。‘新帝国’不是由疆界而是由多层次网络所构成，它没有界限，可以无限扩大；‘旧帝国’把殖民地纳入主权范围，有明显的侵略性和对他种文化的毁灭性，‘新帝国’通过经济政治手段，不断更新调整，于无形中进行控制；‘新帝国’所控制的生产力没有场域，新技术很快普及全球，组成网络，只有‘帝国’可以掌握全局。”（8）乐教授认为的霸权努力使全球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更高的垄断阶段。他们设想民族国家消失了，只剩下一些构成经济关系与网络，这就是全球霸权的实现方式。但是，乐教授对这种情势下的文化存在状态的估计却是可以讨论的，她认为：以便分而治之；‘新帝国’通过网络统治，可有更大的文化包容性。”（9）问题是，种族差异不是制造出来的，种族旧帝国主义者与殖民地民族的冲突到处都有，而后殖民时代的种族冲突也随处可见。撞机、肉弹、中东不熄的战火。于是，美国人在检讨多元文化的政策，美国价值的普适原则已经表明，文化多元性已经被文化一元化所置换。借用电影格式化，美国要求“世界网络”所有的软件被美国价值格式化，然后“准入”。否则就是邪恶的，危险的和构成威胁。美国好莱坞影片中掌握高科技的邪恶者往往采用“洗脑”、“植入芯片”的手段去剥夺别人思想、情感和自由，控制政治家的思想方法上倒真的有点儿像电影人物。这不仅使人想到：是政治家抄袭了电影人物的手段方法，还是电影人物

境下，中、美戏剧交流还有可能吗？未来如何？

四 隐喻的构成与寓言的涵义

疑虑面前，我觉得更有必要回顾中、美戏剧交流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所蕴含的意义来启发今天的深入思考。中、美戏剧交流史，就像是近、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寓言和东西方关系构成的一种隐喻。从其中，大致是可以抽取出一一些经验和思考的。

现代戏剧交流史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其意义超出了戏剧艺术本身。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殖民、后殖民语境中，文化交流的困境与误区。强势的傲慢、弱势的自卑、想象的误读、自大意识里的曲解、自弃心态下的认同、碰撞中的意外。文化交流充满希望却遍布艰难的前景，其意味深长的事件、细节投射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文化交流时斑驳的现实。

美戏剧交流对于东西方关系的隐喻性同构与寓言性揭示，既是一个文化研究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国际关系的世界问题。本文使用的是狭义的文化的概念。但读者将要看到，狭义的文化概念永远无法离开广义的文化概念而存在。就像谈近、现代、中、美之间近、现代大文化交流、东西方大文化交流的近、现代“语境”一样。

正是中、美现代戏剧交流史上的梅兰芳现象，他对美国的访问演出，是中国戏剧与美国戏剧在长期的远观与对望后，出乎人们预料地获得了演出成功，又出乎人们预料地被人冷淡——被当时以知识界为代表的中国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地冷落。梅兰芳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名演员去访问演出的，他更是作为中国戏剧乃至中国文化的某种象征而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荣辱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梅兰芳的访美演出情形更像一个隐喻，一个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隐喻。正是中、美戏剧交流中颇具隐喻性的一页，而整个交流史上许多时段发生的同样意味深长的交流事件与细节，却构成了以戏剧交流为载体、以东、西方文化交流为精神实质和价值内容的文化学研究个案。

美国戏剧之间的交流，实在是有很漫长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毫无疑问，梅兰芳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人物。他是中国戏剧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兼有传统中国戏剧的象征意义，成为了中国与美国戏剧交流中的一个文化符号。梅兰芳于1930年初抵达，开始了在美国轰动一时的巡回演出，获得两个荣誉博士学位，在美国形成了“满国争相看梅郎”的盛况，成为文化英雄。梅兰芳在美国的成功是轰动性的，梅兰芳的舞台风姿、优雅手势与中国戏剧的程式化艺术特征，在美国风靡一时，成为艺术界的热门话题。但是，这次由梅兰芳的巡回演出在美国掀起的中国戏剧“热”随着梅兰芳离开美国，很快就冷却了，远不象今天人们所能想象的那样被当作一个民族文化英雄来对待，只是在京剧界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倒是苏联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斯拉夫、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的成功，邀请梅兰芳访问苏联，这才结蒂了布莱希特与中国戏剧的不解之缘，这才使中国戏剧学术化地走向了欧洲，

一时也。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山河破碎，暮鸦斜阳，再好的艺术表演，自己人看着满眼凄凉，别人可没有动力，不过听听而已，不会认真当件宝贝收藏的。在内战与抗敌驱日、赶走帝国主义的浴血奋斗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呼唤着雄赳赳气昂昂的醒狮！作为中国形象的文化符号，在被殖民国家时期和以不屈的反抗、战斗复兴崛起的民族国家时期，梅兰芳是变化的。同样，中国戏剧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处境，也发生了变化。这是研究中应该充分注意到的。这种转化，也

一种变化。从奴隶到伙伴、敌人、与对手，这在种关系的频繁变化中，美国和西方也在调整各自的政策，这要影响到国家关系常常可以相互为喻，文化交流的具体事件又往往能够以小见大。

五 中、美现代戏剧交流的研究意义

文化交流现象，中、美现代戏剧交流在殖民语境与后殖民语境的近、现代国际文化交流中是格外具有典型性的文化现象。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交流碰撞中的相互态度、自我定位、影响态势、冲突调适、认同排拒、变迁转型的文化学意义，功能学派学理，而且，这种意义对于一方面鼓吹、盲从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又申言文化多元化但又无力也无效去解决体系的价值互难相容这个突出问题的当今世界，是富有启悟力的。这种研究不是一种谏语或预言，而是一次历史追索。“读史以鉴今”，在于让今人了解这些历史现象所承载的寓言性价值与隐喻性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调适自己的文化态度。认识自己的文化价值、珍视自己的文化个性，在于使今天的文化人与决策者在文化交流中保持一份清醒、坚守一块阵地、二、“东方学”及其“东方学”表述的文化霸权问题已经是被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们姿态不同、深浅不一地讨论了数十年。Edward·W·Said)的《东方学》出版后，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文化学或新“文化人类学”出现了一个讨论。发展为各国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文学的研究，展示了新的角度与空间，更为国际文化交流的考察和研究牵引出“东方学”、“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化人类学”、“文化政治学”、“文化价值”等问题或概念的活跃讨论与思想成果，为跨文化艺术和跨文化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学术养分。

世界将这些养分引入文学、艺术研究的努力，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充分。实际情况是：理论介绍远多于运用实践。而在于研究者似乎对这些理论成果和学术思考还没有敏锐地抓到其对于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确认的重要。研究或称为比较研究的一些成果，主要还停留在影响研究或一般的异同比较上，更要命的是还热衷于层出不穷的新名词。缺少思考、没有自身理论生成的泡沫学术，这是不能不注意、但此间似乎无须去特别指明的。

量下，本课题的研究就显现出了其双重性的拓荒意义。第一层的拓荒意义是：有一些零星文章或著作涉及到中、美文化交流历史进行整体观照或研究的成果。第二层拓荒意义是：在一般的文学、艺术跨文化比较研究、影响的视野外，这不是离开戏剧艺术的交流，而是进入艺术交流的文化学、社会学版本。

是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学意义？

是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代表不同的民族经济利益和文化体系。中国戏剧和美国戏剧作为世界上的两个重要国家之承载也折射着两个民族（也是东西方民族）、两种文化体系（也是东西方文化）之间交流过程中的那些意味深长、探索，我的研究就是以中、美戏剧交流为载体、总结其体现出来的人类文化交流的普遍意义和中、美戏剧交流在文化意义，籍此为我们在文化全球、经济一体的今天思考文化个性、文化身份和文化交流向度提供一点有益的思考材料。今天世界上的一门显学，这是有深刻背景的。从最早一辈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或人种学研究者开始，就是感受到伴生的族群生活在世界秩序与人类生活中的意义，才有艰苦卓绝的研究展开并获得了洋洋大观的成果的。但是，在殖民扩张之后，这些研究成果或多或少成为了殖民理论的附庸。殖民主义者自己相信也希望被殖民者相信泛进化论中，或心悦诚服或满腹狐疑或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西方列强预设的政治秩序。

殖民地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纷纷乘势而起，从被奴役、被掠夺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成立了自己独立自主的国家。有过被殖民历史的国家的民族学研究者，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言论和历史的相似性就会格外敏感。在美国价值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进程在新型帝国主义的强势经济、强势军事和强权政治左右下进入了某种预设轨道并且加速向前滑行的时候，人们又把侵略者傲慢的形象和心态作了历史性的联系：“2003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我们孩子，现在美国有了二千三百万人的第五十一州。’他号召共和党和民主党不要再互相指责，要像负责任的父母一样。”世界格局里，文化交流的“语境”问题实际上变得更加突出。西方世界掌控一切的愿望远未过去，而且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现实。体系冲突中的你争我夺变成了美国动画电影《狮子王》隐喻的公推盟主。所以，当我辨析和思考早期中国戏剧在美国土文化交流“语境”时，当我反复捉摸梅兰芳所象征的中国戏剧（也可以看作中国文化）在中、美戏剧交流中（也可以看作“流”（留）的问题时，事实上我触碰的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几乎一个半世纪的问题。中国文化拿什么去交流？交流有效性的条件是什么？

文化交流的历史，关心中华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位置、状态与命运的人自然了然于心，交流的现状，其实也令人忧虑。交流的时代，交流面积之广，频度之快，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强势文化一天也不会耽误扩张其影响，而弱势文化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被同化。那么，弱势文化在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之前有没有交流？要不要交流？以什么样的姿态去交流？交流是可以因主观能动性的作为而获得主动权的事情。要从历史获得经验：清醒地认识具体语境下的交流方式及其后果。文化交流不是多聪明的事，但也有过不少愚蠢之举。其中最为愚蠢的莫过于以意识形态好恶去判断异己的文化价值与艺术含量。在文化交流中的人类处在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族群必然要坚守的不同利益中。影响判断，遮蔽视野，造成文化交流中无论误解的变形、强迫的曲扭和交流的无效。处在这种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取舍迎送便要格外审慎。

必须打破作为“强权政治”世界秩序表征的交流规则——“话语霸权”，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必须保持自己

《美国华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花城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P423。

Chinese Other(1850-1925), An Anthology of Plays, edited by Dave Williams, University Press

997。

Bowers, The Theatre In The East,

New York by Thomas Nelson & Sons Limited, 1956, P 272。

Theatre Journal》， Vol.12, (Spring 1995), P 175~190。

报》2002年11月17日第7版)。

布什原则西方人文传统新保守主义》，《读书》2003年第8期，P 3。

《文化霸权理论与文化自觉》，《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P 5。

《布什原则西方人文传统新保守主义》，《读书》2003年第8期，P 9。

厦门大学图书馆